

# 從平城到洛陽

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

遼耀東 著



4

東大圖書公司



4

東土圖書公司

# 從平城到洛陽

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

遼耀東 著

從平城到洛陽: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 / 遼耀東著.

——初版二刷。——臺北市；東大，2002

面；公分。——(糊塗齋史學論稿；4)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57-19-2571-3 (精裝)

ISBN 957-19-2572-1 (平裝)

1. 中國-歷史-北魏(386-534)

623.61

89018129

網路書店位址 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

◎ 從平城到洛陽  
——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

著作人 遼耀東  
發行人 劉仲文  
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
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 
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
地址 /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 
電話 / 二五〇〇六六〇〇  
郵撥 / 〇一〇七一七五——〇號  
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
門市部 復北店 /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 
重南店 /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 
初版一刷 西元二〇〇一年一月  
初版二刷 西元二〇〇二年九月  
編號 E 61036  
基本定價 陸元捌角  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

有著作權·不准侵害

ISBN 957-19-2572-1 (平裝)



## 導言

討論近代中國以前的歷史，無可否認地，邊疆民族與漢民族以長城為基線所發生的衝突與調和，對彼此歷史形成的激盪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題。尤其邊疆民族進入長城之內後，在中國建立統治政權，與廣大的漢族人民，基礎深厚的漢文化直接接觸，促使其自身文化發生轉變，經過不同階段的衝突與調整，最後融合為一。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演變與發展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和積極的作用。

不過，對於這個問題，傳統的中國歷史學家卻有另一種解釋。那就是邊疆民族徘徊在長城之外，對漢民族的邊疆，進行不定期而且不斷的掠奪或攻擊時，則將這兩個民族以長城為界限對立起來，認為「非吾族類其心必異」<sup>①</sup>。並以為邊疆民族進入長城之後，則必然通過

① 王船山，《讀通鑑論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一九六七，影印本）卷十四「東晉哀帝」：「夷狄之與華夏，所生異地。其地異，其氣異矣。氣異而習異，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。乃於其中亦自有其貴

「用夏變夷」的階段，最後達到「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」的境界。<sup>②</sup>這種以長城為基點，漢文化為本位的論點交互應用所作的解釋，固然突出了漢文化的優越性，與在文化接觸時所表現的彈性與兼容性。<sup>③</sup>但卻將兩種不同類型文化接觸與融合的過程單純化了。<sup>④</sup>這種感情

賤焉。特地界分，天氣殊，而不可亂，亂則人極毀，華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。」是這種論點最高度的發揮。

- ② 夷夏對立的問題，一向是傳統中國史家注意的問題，爭論也極多。一般說來，傳統中國史家多從「文化」上的區別，來評斷夷夏的對立與否，並從文化上來貶抑夷狄。這種論點當自殷周之後才形成，並在孔子及其後的儒家理論中，佔有重要地位。孔子所謂：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」（《論語·八佾》）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」（《論語·憲問》）等，就是從「文化」的觀點來區分夷夏。夷夏對立觀點確立之後，則「用夏變夷」以及「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」，就很自然的成為儒家的理想，譬如：韓愈〈原道〉所謂：「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諸侯用夷禮則夷之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。經曰：『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。』」詩曰：「戎狄是膺，荊舒是懲。」今也，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？」從這裡多少可以窺見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對夷夏問題所持的態度。

- ③ 姚從吾師對於中國文化的兼容性，有獨到的發揮，見〈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〉，原載《大陸雜誌》，十五卷六期（一九五七），後收入《東北史論叢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一九五九），上冊。

性的解釋，即使在近代與西方文化接觸後，仍然發生支配性的影響，使中國在和近代西方文化接觸過程中，產生許多不必要的挫折。<sup>⑤</sup>

- ④ 兩種不同類型文化接觸與融合的過程，人類學家有繁多的理論。即以現代研究中國歷史的中外學者而言，其理論也極複雜，並不像傳統史家的單純化解釋。譬如：姚從吾師認為：中華民族與文化的形成，經過「五大醞釀、四大混合」，邊疆民族文化和中原儒教大同文化接觸後，雖然經過不同的階段，但最後兩者都融合為一了。參見註③。陶晉生兄在研究華北女真漢化後，認為：自金朝建立後，女真人就逐步漢化，因而引起內部危機，包括政治鬭爭和社會衝突，本土化運動等，最後終因各種因素的配合，而達到較為徹底的漢化。事實上，女真漢化的過程，可以由「涵化」(acculturation)的理論，來解釋其中部份現象。參看：黃清連，〈評介陶晉生教授著：《十二世紀華北女真漢化研究》〉，《中華文化復興月刊》十卷七期（一九七七）。西方學者們的解釋，也相當複雜，如：社會史家艾伯華(W. Eberhard)採取一部份傳統中國的全部漢化說，並認為外來征服者與漢族人民有相互的影響。維特佛格爾(K. A. Wittfogel)認為漢族並不能完全吸收收入侵的外族，遼、金、元、清都沒有被中國同化。賴德懋(O. Latimore)認為遊牧和半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處於對立的地地，誰也不能同化誰。費正清(J. K. Fairbank)與賴世和(E. O. Reischauer)認為華夷有共同治理中國的經驗，其制度通常是二元的，他們部份同意邊疆民族最後要走向漢化。以上西方學者的解釋，參看：陶晉生，〈歷史上漢族與邊疆民族關係的幾種解釋〉，《邊疆史研究集——宋金時期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七二）。

事實上，即使那些進入長城的邊疆民族，最後放棄自己原來享有的文化傳統，完全融合於漢文化之中，其歷程也往往是非常轉折與艱辛的。因為文化接觸與融合的因素非常複雜，往往在接觸與融合的過程中，一旦遭遇挫折與阻礙，必須經過不斷地再學習、再適應、再調整之後才能完成。而且不論融合或被融合的雙方，都必須付出很高的代價，甚至被融合的民族完全放棄自身的文化傳統，但仍然有某些文化的因子，無法完全被融合而殘留下來。這些殘留下的文化因子往往在被吸取後，經過轉變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成份；不僅豐富了漢文化的內容，也增強了漢文化的活動力量。中國歷史自魏晉以後，由於邊疆民族不斷湧入長城，結束了漢民族在長城之內單獨活動的時期之後，漢民族不斷和不同的邊疆民族進行接觸與融合，使漢文化增添更多的新內容，中國歷史的發展也更加多姿。

拓跋氏族進入長城後的文化轉變，就是上述理論的一個最好例證；並對中國歷史的發展，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，在永嘉風暴中，拓跋氏族最後進入長城，不僅收拾了黃河流域的殘局，並總結了自秦漢以來，漢民族與邊疆民族以長城為基線的衝突與鬭爭。同時對東漢以來，滲入長城的其他邊疆民族作了一次融合，然後以此為基礎，和漢民族作一次徹底的融

⑤ 參看：拙作，〈城裏城外——談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知識份子〉，《魏晉史學及其他》（臺北：東大，一九九八）。

合。經過這次融合以後，新的血輪注入漢民族之中，新的文化因子也開始在漢文化中孕育。後來，這些新血輪與新文化因子，又轉變成支持隋唐帝國建國的基礎。

從太祖拓跋珪天賜三年（西元四〇六年），創建平城作為北魏前期的首都，到高祖拓跋宏太和十七年（西元四九三年），為了準備遷都而規建洛陽，前後經過將近一個世紀。這一個世紀是拓跋魏文化轉變的重要時期，由最初胡漢雜糅的文化形態，轉變到最後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，融於漢文化之中，是本書討論與探索的範圍，其中包括〈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〉、〈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〉、〈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〉、〈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係〉、〈北魏平城對洛陽規建的影響〉、〈北魏與南朝對峙期間的外交關係〉，都環繞著這個論題，研究拓跋魏與漢文化直接接觸後，在不同的轉變階段，所產生的不同的問題與影響。

一

原居於嫩江東北，額爾古納河東南地區的拓跋氏部族，最初雖然有了原始的農業生產經驗<sup>⑥</sup>。但正式由遊牧轉向農業生產，卻是徘徊在長城之外的一〇五年的後期。當時他們的遊

導言

5

⑥ 河地重造，〈北魏王朝の成立とその性格について〉，《東洋史研究》，十二卷五號（一九五三）。認為拓跋氏部族最初已有農業生產，但這種農業生產是微不足道的。



牧區漸漸越出河套地區，游牧的範圍西到五原，東到幽州的代郡和上谷附近。這一帶正是漢武帝擊敗匈奴後，極力經營的地區。漢武帝曾在這裡築塢堡，開郡縣，移民實邊。雖然當時祇為了消極的佔領，將長城的防線延伸到草原與農業的過渡地帶，卻意外地將農業文化的種子，播散到草原文化地區的邊疆，在那裡形成許多分散的小農業社會單位，對後來草原和農業文化的接觸和融合，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<sup>⑦</sup>。

作為草原與農業文化分界線的長城，由於漢高祖七年平城之役失敗後，退縮為防止邊疆民族入侵的防線。此後維持長城防線的安寧，成為每個時代對外的主要策略。如果農業社會的軍事力量超越草原民族，並且深入沙漠，便會在長城外農業與草原的過渡地帶，建立許多防衛性的屯墾區，成為小農業社會單位，以拱衛長城防線。不過，一旦農業民族的力量又退回長城，無法控制這些邊緣地區的防衛據點，草原民族的勢力就立即進駐這個地區。

這些分散在長城外的小農業社會單位，在農業民族的力量撤退以後，便斬斷和長城內母體社會的文化臍帶關係而獨立發展。因為地處於農業和草原的過渡地帶，很快就形成半農半牧的社會經濟形態。草原民族進駐這個地區後，漸漸放棄一部份游牧，採取某種程度的農耕。在那裡且牧且耕，等待機會向長城之內滲透。當農業社會民族的力量退縮，而且長城之內的

⑦ 拙作，〈勒馬長城〉，《魏晉史學及其他》。

政治或社會情況又在動盪的時候，停留在這個地區的草原民族，便乘機翻越長城進入中國，在長城之內建立統治的政權。於是另一個草原民族又迅速遞補，進駐這個地區，在那裡等待機會進入長城。

那些進入長城的邊疆民族，不僅建立政權，而且開始修補長城，更進一步代替農業民族執干戈以衛長城，阻止另一批草原民族入侵，並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，採取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，而漸漸漢化了。至於漢化程度的深淺與緩速，恰和他們居住這個地區時間的久暫成正比。這是討論自漢以後，滿清入關以前，草原與農業文化接觸與轉變，可探索的軌跡。本書附錄〈試釋論漢匈之間的甌脫〉，即探討這個地區建立的經過，及草原民族進駐這個地區後，文化與社會形態轉變的過程。

拓跋氏部族也曾在這個地區居停，而且居停了較久的時間，〈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〉，即討論拓跋氏部族在這個地區文化轉變的過程，及其進入長城建立國家後，所發生的作用 and 影響。不過，拓跋氏部族進駐這個地區之初，游牧經濟仍然是主導的力量。因為游牧經濟不僅是他們的主要生活資料，也是他們對外擴張的戰鬥力量。但是當拓跋氏部族積極發展畜牧事業的時候，已經開始經營農業了，除了這個地區原有的農業基礎影響外，拓跋氏部族經營農業最現實的原因，還是由於不斷向外擴張。由於他們不僅獲得大量的牲畜，並且劫掠

了眾多的人口，再加上許多歸附部落，原有的社會經濟基礎，不足以維持所統治人民的生活，不得不從事農業生產。

不過，最初拓跋氏部族的遊牧民，並沒有直接從事農業生產，農業生產的工作是由原居住在這個過渡地區的「烏桓雜人」及「雁門」晉人負責。他們原先就在這裡從事農業生產，並沒有因為拓跋氏部族的統治，改變原來的生產方式。後來由於拓跋猗盧協助劉琨，而獲得雁門陘北五縣之地，劉琨將原居住在這個地區的人民遷走。於是拓跋猗盧立即遷徙原來他統治下從事農業生產的「烏桓雜人」與「雁門人」，填補這個真空地區，利用原有的農業生產基礎，有計劃地從事農業生產。至於拓跋氏部族的部民參加農業生產，卻在什翼犍被苻堅所滅，拓跋氏部族瓦解以後，苻堅分散其部落於「漠障故地」，強迫原來的拓跋氏部族的遊牧民定居下來，並且遣派官員監視他們從事農業生產。對加速拓跋氏部族的游牧經濟形態轉向農業經濟，產生了關鍵性的作用和影響。後來太祖拓跋珪登國九年（西元三九四年）拓跋儀在五原至櫛楊塞一帶的屯田，便利用這個基礎繼續發展，並獲得豐碩的成果。這次屯田的成功增強了拓跋氏部族發展農業生產的信心。因此，在這次屯田的後三年拓跋珪便從他控制的地區，遷徙「山東六州」民吏三十六萬口，到首都平城的京畿地區。<sup>⑧</sup>這批徙民到達之後，立即計

<sup>⑧</sup> 唐長孺，〈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〉，認為「六州」是指後燕故地。見其著：《魏晉南北朝史論

口授田，並配給耕牛，有計劃地發展農業生產。過去，拓跋氏族祇利用過渡地區的農業基礎，從事有限度的農業生產，這次卻是由中原地區真正的農民，直接擔負起農業生產的工作。

農業生產雖然擴大了，但拓跋氏部族的遊牧經濟的畜牧事業，並沒有因此而衰退，仍然是國家收入的主要部份。（國家的稅收還是以牛馬的頭數計算；對外征戰的俘獲品中，賜賞臣下的仍以畜產為單位。）同時，拓跋氏部族的草原文化氣息，也不因農業文化擴大影響而減弱。因此，拓跋氏統治者雖然分割固定的區域，給那些歸國的部落酋長居住，但仍然允許他們保持「夏歸部落」的遊牧習慣。而拓跋氏君主每年六月也到陰山「卻霜」。雖然拓跋君主已建立平城為固定的都城，但大部份的時間，仍車駕奔馳在外，享受著遷徙、射獵的草原生活情趣。在日常生活的衣食方面，雖然他們非常欣賞農業社會的錦帛，但卻不願放棄傳統的衣著，太武帝拓跋燾就明白的表示：「國人皆著皮袴，何用絲帛！」酪漿畜肉是草原民族主要飲食，即使後來熱愛中國文化的孝文帝，仍然不願放棄這種傳統的飲食習慣。

固然，在兩種不同類型文化接觸時，某些文化的特質比較不易同化，而被保存下來，這是每一個社會文化轉變期間共有的現象。但是拓跋氏君主最初為了表現征服者的優越感，頑固地堅持自己的文化傳統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。太祖拓跋珪就認為「國俗敦樸，嗜欲寡

少，不可啟其機心，而導其巧利。」並反對他的部民接受中原文化。後來到世祖拓跋燾時代，農業文化已在各方面，對拓跋氏族擴大了影響。再堅持抗拒這個潮流已不可能，但拓跋燾對於文化的轉變，仍然採取保留的態度。他認為文化的轉變不可操之過急。「有似園中之鹿，急則衝突，緩之則定。」

拓跋氏君主對文化接觸的態度既然如此，但事實上，當拓跋氏族進入長城以後，由於對外戰爭的勝利，佔領的地區不斷擴展，統治的人口也隨著增加。以他們過去部落時期統治的經驗，已無法統治一個人口眾多，文化與經濟都超越他們的社會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就必須一個完善的制度，以及支持這個制度的文化基礎。可是對此二者，拓跋氏君主像過去其他統治中原地區的邊疆君主一樣，仍然淺薄無知。為了填補中間的文化空隙，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政權，就不得不從中國文化傳統及歷史裡吸取經驗。拓跋氏君主對於中國文化的興趣非常廣泛，他們既愛儒家、又喜黃老，不過他們似對法家更有偏好。因為透過法家思想的媒介，可以將部落時代首長的絕對權威，過渡到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的政體來。

因此，拓跋氏君主最初所需要的，並不是純粹的漢文化，而是從漢文化中吸取統治的經驗。所以，最初在政治上引用的漢人，也不是純粹的漢人。多是「居近塞下」有胡化成份的漢人，或「往來國中」受農業文化薰陶的胡人。這些人生活在兩種文化之間，對草原文化的

方式沒有隔閡的困難，可以與拓跋氏君主合作無間。另一方面對農業文化也有某種程度的了解，可以協助拓跋氏君主解決兩種文化接觸時，所產生的種種問題。這也是在中國歷史上，每一個草原民族進入長城之後，建立統治政權之初，必須引用這一類型人物的原因。<sup>9</sup>他們對於北魏王朝的建立有不可磨滅的影響，由於他們居間的協調，緩和了當時草原與農業文化接觸時的衝突。

## 二

「居近塞下」與「往來國中」的漢人和胡人，雖然對北魏的建國貢獻了他們的力量。不過，拓跋氏部族統治的範圍繼續擴大後，他們的能力和經驗，已不足應付迅速發展所形成的複雜局面。於是拓跋氏君主就不得不把目標轉向有政治經驗的中原士大夫。對北魏建國有積極貢獻的燕鳳和崔玄伯就是在這種情形下，參加拓跋氏的政權。不過大批的中原士大夫參與拓跋氏政權，卻是在拓跋珪皇始二年（西元三九七年），破後燕慕容寶於中山之後。在這次戰役中，不僅獲得慕容寶「所署公卿、尚書、將吏、士卒降者二萬餘人」。同時得到「皇帝璽綬、

<sup>9</sup> 參看：姚從吾師，〈遼金元時期通事考〉，《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》（一九六七）；楊聯陞，〈中國文化中的媒介人物〉，《大陸雜誌》，十五卷四期（一九五七）。

圖書、府庫、珍寶，簿列數萬」。拓跋氏部族利用這批戰利品作基礎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，完成了建立一個國家所需要的典章制度。

永嘉風暴以後，黃河流域所建立的許多邊疆政權中，慕容氏所建的幾個國家，漢化的程度比較深，對中原士大夫也比較尊重，因此得到中原士大夫的支持與合作。拓跋氏政權很幸運地承繼了這個成果。拓跋氏政權不僅從慕容氏獲得建國所需要的資料，後來又從河西接受了支持這個國家的文化基礎<sup>10</sup>。這是當時許多邊疆政權在黃河流域匆匆建立，又匆匆崩潰；而拓跋氏部族卻能在不斷的演變中，不僅結束了北方的動亂，又維持一百五十年統治政權的主要原因。不過，中原士大夫的智慧與經驗的結晶，卻是北魏建國的基石。

可是，拓跋氏統治者對於貢獻心智的中原士大夫，並無感激之情，因為他們是被征服者，既得不到適當的尊敬，也得不到適當的待遇，祇有憑藉著征服者的意旨工作，對非我族類的草原文化特質不敢觸動，更談不上進一步的改革。所以許多草原文化的因素被留下來，形成北魏建國初期在典章制度，在官制、禮樂、車服各方面，「稍僭華典，胡風國俗，雜相揉亂」的形態。

這種「雜相揉亂」的形態，自拓跋珪建國以後，相繼發展；到拓跋燾時期，面臨著一個

<sup>10</sup> 陳寅恪，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》，《陳寅恪先生論文集》（臺北：九思出版社，一九七七）。

抉擇的時代，也是北魏前期歷史與文化轉變的關鍵時代。因為這時北魏不僅統一了黃河流域，結束了永嘉以來中國北方混亂的局面，而且北魏的勢力深入西域，這是自漢帝國崩潰後所沒有的現象。另一方面，江南的局勢也在變化，劉宋篡晉自立，形成中國歷史上南北對峙的局面。

不過，這時在北魏的內部，卻有許多草原與農業文化接觸後所產生的問題等待解決：到底保持原有的草原文化形態？還是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，投入漢文化之中？或是仍然維持現狀，繼續這種雜相揉亂形態的發展？對這些問題，他們感到困惑與徬徨。這是拓跋氏族匆匆採用中國的文化形式，鑄造自己國家後，發展到現在需要一次文化的調整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崔浩躍上了歷史的舞臺。

崔浩是一個從中國文化傳統裡，薰陶出來的典型知識份子。但在動亂中的知識份子命運是很悲慘的，尤其永嘉風暴後的北方的知識份子，更是如此。他們在動亂中流離失所，從一個邊疆政權，過渡到另一個邊疆政權。為了生存，放棄了知識份子的尊嚴，在征服者的羽翼下討生活。他們唯一的目的，就是在動亂中保存自己及家族的生命。沒有希望、沒有理想、更沒有對現狀改革的企圖。可是崔浩卻不同，他有突破現狀的雄心壯志，這正是後來他的悲劇產生的主要原因。〈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〉，所分析的就是崔浩為實現自己的文化理想，但



卻在殘酷的政治鬭爭中，不僅犧牲了個人和他的家族，還有一大批追隨他的中原士大夫，是這幕悲劇形成的背景。

崔浩不僅對中國文化有宗教的熱忱，而且對在動亂中沒落的門第懷有濃厚的感情，更對因門第而形成的世族政治充滿懷念與憧憬。但我們卻不能忽略他的一生，完全消磨在這種胡漢雜糅的社會中。在他七十歲生命的前二十年，隨著他父親崔玄伯在不同的邊疆政權中流轉，最後進入拓跋氏政權。因此，在他的人格形成階段，分享兩種不同的文化生活，他的家族所教育他是一種行為模式；他生活的社會所給予他的，卻是另一種形態。尤其進入北魏以後，所面臨的又是一個胡漢雜糅社會。但由於過去的經驗，他了解如何適應這個社會。因為他對草原文化有深刻的認識與了解，他知道如何為拓跋氏君主服務，並且獲得他們的賞識與信任。使他能拓跋氏權力中心中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不過，在他內心深處卻充滿文化的優越感，在他看來，對於中國文化的保存與發揚，不僅是他的責任，甚至是一種神聖的使命。

崔浩鄙視與嫌棄在他生活的社會中，所保存的草原文化因素，而且態度非常固執與偏激。因此，祇要他一把握機會，就會對這個胡漢雜糅的社會進行改革，但也僅僅止於改革而已，並沒有推翻現實社會的企圖。而且他謹慎又努力地替拓跋氏君主工作，祇希望在拓跋氏君主的支持下，完成他的改革。他最佩服的歷史人物是王猛。他也想像王猛一樣，得到苻堅的絕